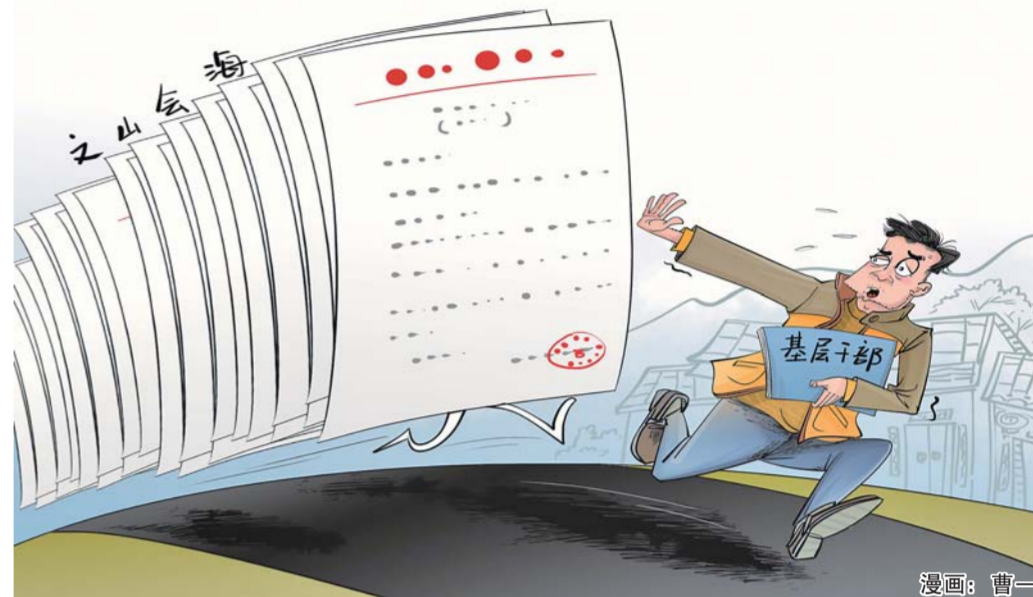


填表太多,一个镇一年花30万买纸张油墨

不仅“文山会海”在一些地方卷土重来,奢靡享乐也转入地下,“四风”仍在滋生新变种



漫画:曹一

一般性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因其所伤害的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更伤害到整个作风建设的长效性。

专家表示,“不吃公款吃老板”会形成利益输送,官商勾结,把一些原来可以摆到台面上的问题通过饭局来解决,会成为一个严重的腐败问题,尤需值得警惕。

反四风进入“深水区” 驰而不息加以整治

“一些容易被发现的四风问题正在解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更为棘手的深层次四风问题。”庄德水说,这些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并不是出台八项规定之后产生的,整治起来也需要更多时间。

面临反四风的高压态势,部分党员干部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创新性”的做法可以逃脱纪律审查、法律制裁。“说到底,这些问题背后是八项规定执行不到位,是四风问题变异转移的结果。”庄德水说。

庄德水、傅学俭、福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甘满堂等认为,反四风已经进入“深水区”,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真正树立服务型政府的观念,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基层“文山会海”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上级部门要进一步简化行政事务的流程,真正给基层减负。不能简单地给基层施加压力,应当根据行政事务工作需要适时提出信息汇报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把信息汇报任务施压给基层。

“要压缩会议规模,会能不开就不开,能开电话会议就开电话会议。”庄德水说,不要把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简单地看成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或者是政治表态的机会,应该看到它是贯彻落实执行中央政策的有效方式,通过文件、会议能够形成思想共识,让大家了解中央政策,更

果,所有这些内容都必须公开。”庄德水认为,公开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反四风的有效手段。

“不吃公款吃老板” “四风”滋生新变种

由于工作措施比较有力,“四风”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控制,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享乐奢靡之风的一些新动向、新变种不容忽视。

一方面,违规行为更趋隐秘。十八大后,作风建设越抓越紧,一些干部改为“不吃公款吃老板”,有的利用私营企业内部接待场所安排宴请,有的在公开场所消费后实际由企业老板买单,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没有动用公款而心安理得,企业老板为拉关系乐此不疲。此外,一些公款吃喝由高档豪华饭店转移到单位内部食堂或者偏僻隐蔽的农家乐及个人家中,也不容易被发现。

送礼由地上转入地下,送礼地点从单位、居民小区转移到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偏僻角落;送礼的方式由送钱送物改为发微信红包、送电子预付卡、网购礼品等,变相收送红包礼金现象仍然存在。

“市场的茅台都卖脱销了,不可能都是普通老百姓喝了。我们请官员吃饭,重要部门的,手握实权的,即使只是县里的科级干部,都得上茅台,发高档香烟,你不上这些,人家觉得不尊重他,不仅事情办不成,而且还可能留下坏印象,这样的话,这顿饭可能就白请了。”湖南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四风”问题滋生新变种。

一是变相发钱。套取资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假借加班、值班、专项工作等名义发放福利待遇。如浏阳市体育局违规批准三名职工停薪留职,套取三人工资将近60万元设立“小金库”用于账外开支,其中违规发放体育局干部职工福利27万多元。

一些地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巧立名目发放津贴补贴。福州市、仓山区两级纪委调查发现,2014年、2015年春节前,盖山镇以“担负征地拆迁、信访维稳工作任务重,对家庭欠亏多”为由,向20名领导班子成员家属发放“贤内助”慰问金,纪委部门对此进行了严肃查处。

二是变相公款旅游。以学习、培训、招商等名义外出考察,期间擅自变更路线和更改行程到景点观光;假借党员活动等名义组织外出旅游;有的干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邀请,通过旅行社安排其本人及其亲属出游。

三是变相办酒。采取只收礼不设宴、分批宴请等方式逃避制度约束,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四是违规用车。私车公养,以使用私车办公事为由,将私家车的油费、维修费等使用公款报销。违规借车,有的单位占用或长期“借用”下属企事业单位或私营企业的车辆;有的单位将车挂靠在私人名下,逃避监督。

“原来需要用公款支付的旅游、消费,现在变了形式,运用这种账面上的合理性掩盖腐败的行为,这是一种变异的腐败行为。”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腐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

说。同时,专家指出,要提高发文的执行力和开会的效率。“真正切中百姓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凝聚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事业心,形成思想共识。”庄德水说,“不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而要让文和会达到预期效果。”

当“二传手”“踢皮球” 落实工作敷衍塞责

“文山会海”的根源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地纪委近期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热衷于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将工作任务层层传递分解,但真正落实工作时却敷衍塞责,“二传手”“踢皮球”现象严重。

“帮扶干部每次来就是让签字,签了字就走。”“多问几句,帮扶干部就不耐烦,说很忙。”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脱贫攻坚督查组去年在某深度贫困村一个村暗访时贫困户反映的问题,甚至还有贫困户反映,帮扶干部2年内仅“帮”了2本书(帮扶手册);督查组抽查到的不少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对脱贫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等政策不了解或一知半解。

在桂北某村,督查组与第一书记和村委会干部座谈了解到,镇上给这个村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名额为6人,村委会干部称不用宣传,仅从比较困难的群众中挑选了2户。督查组询问第一书记相关问题时,第一书记只能低头玩手机,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对这个村贫困户退出、低保户认定及《帮扶手册》填写等相关扶贫工作均不熟悉。

“对这样流于形式的帮扶,群众肯定不满意。”自治区扶贫办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像是慢性病。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会严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必须严肃追责。”厦门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重拳出击,下大力气整治。

厦门市同安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审判员沈木春在办理尚未执行完结的案件过程中,虽已查询到可供执行的财产,却没有按照规定及时采取冻结、查封等措施,导致相关案件财产被转移,案件没有及时办结。2017年5月,同安区法院给予沈木春行政警告处分。

2017年5月,漳州市东山县东沈村东赤港被列为入海口环境整治点,分管环保工作、挂点东沈村的负责人林旭敏,没有到一线部署,没有到现场巡查,只将任务口头交代给东沈村相关负责人,导致该区域脏乱差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整治。东山县纪委因此给予林旭敏党内警告处分。

部分干部群众反映,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做而不实,干工作“走过场”现象仍然存在。专家认为,对领导干部办事拖沓,甚至为官不为的行为,要创新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和负面清单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行政批事项;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行政审批事项,要实行问责。

“现在已经开始实行权力的清单化和公开化,把整个权力运行过程和事项审批的过程向社会公开,让当事人明白行政事项审批已到哪一个程度了,可能会在哪一个时间节点获得相应的结

果,这位转业军人2016年底怀着一腔热情去扶贫,结果被浇了一盆凉水。

去年5月老孙为村里谋划了养猪项目,向当地扶贫办申请20万元资金,并通过审批。如今猪仔都出栏了,钱只拿到一半。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准备了一肚子理由,就换来俩字:等着。

更奇怪的是,这笔资金可以建猪圈、进猪苗,却不能买猪食。现在猪食费用占到整个项目的30%左右,以后还会越来越多。“难道让猪靠喘气长膘吗?”老孙气呼呼没办法,靠赊账搞扶贫,现在赊了10多万元。“今年底村子脱贫,我倒成了贫困户!”老孙苦笑着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扶贫干部为贫困户掏腰包是普遍现象,负债欠钱的有十几位,金额从几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扶贫干部欠债的情况分几种:

借钱背债型。山西一个贫困县的第一书记小张去年初申报了建设旅游设施的项目。村民看好,企业看好,但领导不看好,“还是考虑光伏吧,保险!”可村里能安光伏的贫困户都安了啊。小张几经争取,相关部门同意先干起来。但钱从哪来?小张向朋友借了几万元,又跟企业打了十多万元欠条,项目才启动。2018年春节前后村子脱贫了,上级很高兴。小张笑脸送走领导,转身再跟催债的赔笑脸。

赊账背债型。为了发展养猪项目,老孙以村集体名义向养猪企业、饲料企业、建筑队分别赊账,但“催账的不认集体,只认我!”老孙说。

担保贷款型。西南某省一名第一书记为村里发展泥鳅养殖,苦等三月项目批不下来,只好用工

资抵押贷款60万元,每个月还3000多元利息,搞得婚姻一度亮起红灯。

铤而走险型。大岳山区的一位第一书记为村集体企业周转资金时,拿个人房产抵押借了高利贷,媳妇知道后大闹一顿,“还不上可就睡大街了!”所幸及时还上了。

这些干部往往有苦说不出。为了村子长远发展、个人前途和当地领导颜面,他们自己苦苦周旋而不愿向人提。一位欠债干部的事,若不是村民当面说起,他根本不会承认。向记者介绍情况后,他明确要求匿名,然后拉黑记者的手机号、微信号。

有钱够不着 扶贫资金趴账逼出“要钱能力”

当地扶贫资金紧张吗?完全不是。上述欠债干部所在的村或乡,大都有一大笔扶贫资金趴在账上。比如,小张所在的村就有五六十万元的扶贫资金,老孙村里也有数百万元的扶贫资金待花。而去年审计署公布的全国158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显示,84个县形成将近20亿元闲置资金。这批钱像隔着“玻璃门”,看得见,摸不着。

多位扶贫干部直言,建起“玻璃门”的正是部分单位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部分干部的不作为、怕担责等问题。被为难的基层干部总结出“五字经”:一卡。一些项目被繁琐的程序卡在审批途中。年初申请的扶贫资金,一般要到下半年甚至年底才能兑现,然后就赶上无法施工的冬季,只能等到第二年。

二截。扶贫资金截留到县乡。中部某省为

2016年下派的一批第一书记每人配备了10万元资金。其中一名第一书记小贾说:“驻村两年了,钱我一毛没见到,县上说资金整合了。”小贾为村里办小企业,自己掏了8000多元。

三甩。小张介绍说,一些干部不担当,经常以“有风险”为由否决年初申报的项目,资金便趴在县账上。到下半年县里着急,看村里养殖发展得不错,便“甩锅”给村里,强制下拨五六万元,名义是“扩大养殖规模”。但“规模已经够大了,这钱没法花,只能趴在县账趴村账!”

四专。下拨的扶贫资金强调专款专用,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但有的村不缺“酱油”只缺“醋”。老孙的村有数百万元扶贫资金用于修路补墙“整村提升”。记者开车入村,看到村里路和墙没有什么大问题,倒是养猪产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五土。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一位第一书记反映,有些扶贫资金要求当年增值10%,但年底才到账,“一两个月怎么增值?高利贷都没这么赚钱!不少人宁可不要这钱,也不愿意上麻烦。”

政策落实不到位,资金卡在半空中,基层扶贫干部只能“跑空钱进”,从而形成一条明显的“要钱能力曲线”。省市县乡各级下派的第一书记,随着级别降低,申请资金能力随之下降,有的可能一分钱也要不到。同级别的干部中,财政、交通等实权部门下派的干部一般财大气粗,而文联、党史办等冷衙门的干部大多两手空空。

本报记者沈汝发、刘良恒、何伟、朱国亮

“一年下来,我们镇光购买填表的纸张和油墨,就花了30多万元。”

湖南一位基层乡镇负责人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他所在地区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上级要求严,群众期待高,本来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上,但要填的各种表格材料实在太多,一级一级一直到县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每次不花几个小时,根本填不完”。

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批示,对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加强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在新起点上的再部署、再出发,向全党发出驰而不息纠正“四风”、改进作风的行动号令。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湘闽桂苏等省区走访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严重,尤其是“文山会海”现象突出,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深恶痛绝;同时,享乐奢靡之风由地上转入地下,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变种,应驰而不息继续深入整治。

填表、开会、迎检汇报 基层干部疲于应付

“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减少发文,减少开会,我觉得基层实际情况是不减反增。”

2017年年底,在湖南湘潭市某区县,一位基层干部指着办公室里的3个箱子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你看,上级部门考核我们3个项目,每一项都要准备大量台账、文档和汇报材料。”

“现在责任状比以前少了,但有些方面的形式主义更严重了。”湖南湘西州一位镇政府负责人说。

2016年年底,这位负责人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反映,基层责任状“满天飞”,过多过滥——作为乡镇政府负责人,他当年与上级党委政府签了33份责任状,除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还有烟叶生产、网格化管理、劳动力转移和金融环境创建等。

现在,最让这位镇政府负责人头疼的是扶贫工作中的“文山会海”。他无奈地说,“填表、开会、迎检汇报……无穷无尽,有苦说不出,我们基层干部许多精力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了。”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有的部门单位把发文、开会作为贯彻上级精神的主要手段,有的文件空话、套话多,指导性、针对性不强;有的一般性会议也要求基层领导参加,加重了基层负担,增加了行政成本。

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傅学俭表示,推行“痕迹化管理”的初衷是好的,有利于督促基层落实责任,但是过犹不及,重复繁琐的表格材料不仅作用有限,还会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他建议对各种表格材料删繁就简,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将精力真正用在谋发展、办实事上。

“文山会海反映出来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行政思维方式过于简单,习惯于传统的行政流程。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把文和会看成是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而不能把文和会异化成一种工作负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扶贫资金趴账上,有扶贫干部背上“扶贫债”

一些地方“有钱够不着”挫伤了干部积极性,浪费了扶贫资金,拖延了脱贫进度

一些媒体宣传时,往往把欠债当成干部奉献敬业的例证。奉献当然可贵,但不能掩盖背后政策落实不到位、干部作风待改进的真问题

本报记者王井怀

“俺村的扶贫真奇怪,扶贫干部背上债;扶贫资金捆得死,全了猪圈不让买猪食。”近年来,部分贫困村出现一个“怪现象”:一头,扶贫干部为脱贫工作赊账借钱背上债;另一头,大把扶贫资金趴在账上,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动、不敢用。基层扶贫干部和扶贫资金之间隔上了“玻璃门”,看得见,摸不着,干着急,没办法。精准脱贫是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部分地方出现的这种冲到前线没“子弹”的情况,挫伤了干部积极性,浪费了扶贫资金,拖延了脱贫进度。

有苦说不出 扶贫干部背上十多万元外债

47岁的老孙是山西省忻州市的一名第一书记

好地执行当前中央政策。

同时,要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机制。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手段,改革传统的信息报送方式,从而更好地给基层减负,进一步减少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解决‘文山会海’问题还需要革新政府的观念。”庄德水说,从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都在简政放权,运用互联网+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推动整个行政流程再造和行政信息传递,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文山会海背后就是行政效率过低,还运用传统的行政观念,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发展对行政效率的需求,所以党政部门要真正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简化工作流程。”

针对变异腐败问题,有关人士认为,除了加强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机制和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预算和财政制度的创新,真正把领导干部的用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预防一些干部肆意消费公款;另一方面也要建立监督机制,对“不吃公款吃老板”等变异腐败问题加强监督和管理,一旦发现有利输送的行为就要予以惩处,加强纪律建设。

加强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真正让变异的四风问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一旦发现要严加惩处,通过典型案例的曝光,让领导干部能够收敛,真正守住纪律底线。

强化内部的监督和管理。变异的公款旅游和消费往往背后有腐败的决策,很多还是领导班子集体做出来的,他们往往以这种合法的决策形成腐败。同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度,可通过抽查的方式,通过评估或检查发现这种腐败性的决策,避免领导干部利用集体决策的形式来规避个人责任。

另外,专家也指出,从公务员管理体制来说,要推进激励机制建设。“我们现在更多是要求干部不能做什么,但是能够做什么,其实是不够明确的。”庄德水说,通过实施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大大压缩了党员干部的灰色收入和隐形福利,另一方面,一些合理开支应该纳入到预算里,从而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打破“玻璃门” 打通扶贫资金“最后一公里”

怪哉,扶贫干部负债,扶贫资金趴账。当前,我国处在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全国有19.5万名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扶贫干部冲到前线却没“子弹”,仗仗如何打?记者了解到,借钱欠债干部的比例不是很高,但大都是想干事、能干事、一心为扶贫的好干部。不能让奋斗的人寒了心。

这个问题要正视,不要掩饰。一些媒体宣传时,往往把欠债当成干部奉献敬业的例证。奉献当然可贵,但不能掩盖背后政策落实不到位、干部作风待改进的真问题。

2018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相关部门要切实改变作风,把政策落到实处。一些地方试行简化扶贫资金前期审批,加强后续监管的办法,既能加速资金下拨,又保证使用安全,值得提倡。资金使用要形成“合奏”,不要“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现在,几乎每个职能部门都有扶贫资金,但农业的钱只能整土,林业的钱只能种树,规定的用途并非贫困村最迫切的需求。基层希望扩大乡镇、村资金使用自主权,在履行一定程序的基础上,由乡村整合各项资金,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脱不了贫的责任,我负;资金不到位的责任,谁负?”晋北一位第一书记气愤地说,要加大对作风不实的问责力度,清除不合理的资金使用门槛,让钱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地落到扶贫上。